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建设的多维审视

李 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加强社会建设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蕴含鲜明的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和文明思维,以此为指引有助于深化关于社会建设的多维度认识。从出场样态看,社会建设孕育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之中,既遵循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内涵质态看,社会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明确其基本内容,形成“一体两翼”和“五位一体”的内外部结构系统。从文化形态看,社会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为底蕴,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生文化和治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建设;民生福祉;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5)3-0139-05

以惠民生、强治理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重要原创概念和实践向度。其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并在之后历经深刻内涵演变和曲折发展,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全过程。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包括“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在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起,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于社会建设这一历史命题的认识,逐步明确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2024年习近平关于“社会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2]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所赋予的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和文明思维,尝试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建设出场样态、内涵质态以及文化形态的特质特色。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孕育社会建设的独特出场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延展脉络。中国基于民族危机挑战和独立富强

追求而展开的现代化探索可以上溯至近代以来。对此,有学者提出存在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以大历史观为核心的长时段历史思维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整体性考察其本源和流变。以此为方法,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建设道路因何而生、原初内容及特点如何、有何影响等重要问题。

(一)近代中国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引发对社会现代化的主动求索

从现代化起点来看,社会领域的形成是西方现代文明诞生的重大结构标志。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严格地说,它既非私亦非公)的出现却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它在起源上与现代同时出现,并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它的政治形式。”^[4]但社会领域在中国被发现却有其独特背景。中华文明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该如何拂去中华文明的尘霾,追赶世界现代化的脚步?有识之士沿着器物、制度、文化的脉络不断探索解局之道。这一进程行至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因素开始在反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为何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优势研究”(项目编号:21CKS015)阶段成果

以为继的讨论中被凸显出来。有学者指出:“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思想的转换过程,原先企图通过国家政体设计顺利实现社会、文化乃至心理变迁连带反应的期盼完全破灭。”^{[5]18}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需要也必须在社会领域有所作为。这一认识带有面向人及其现实社会关系的鲜明社会视角和诉诸大规模改造运动的社会实践取向,尽管出场时序相对较晚,但仍然奠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厚重社会底色。

(二)“一盘散沙”病症的讨论催生两类社会建设命题

从现代化实践来看,社会领域的结构变动是把握西方现代化特征的重要标尺,以社会政策和公民自治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不断调适和克服自身危机的重要手段。但社会建设在中国的出场却有其独特指向。近代中国知识界喜欢以病象和药方为基本隐喻来讨论中国的危机及其应对。1901年梁启超提出:“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宁惟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消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6]429}较早从社会关系与组织结构发育不足和“一盘散沙”的状态出发反思传统中国的病症及其现代化要求。这开启了在发展实业、建立共和、革新文化之外,以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来克服社会散漫局面,追赶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新思路,并由此延伸出两条重要脉络。在政治领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明确提出:“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7]400}认为社会组织性的彻底改造是雪耻图强、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基础。为此,“教国民行民权”的社会建设成为其建国方略中的重要方面。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社会部,标志着“化社会建设为社会行政”^[8]阶段的开启。这一寓社会建设于国家建设的政治化思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被进一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学术领域,作为社会学家的孙本文提出了以“依社

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和“关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安宁幸福等各种事业”^{[9]465}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命题,体现出通过社会建设学术研究来谋求社会问题之解决和国家危局之挽救的智识担当。以上两条脉络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社会建设的出场样态。

(三)社会建设的出场提升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论高度

一方面,社会建设的出场使得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更加系统深入。通过将社会领域纳入问题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蹒跚起步之时就向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靠拢,初步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领域相复合的现代化目标。在社会维度,这一现代化探索着重以近代国家、社会关系剧烈变动下逐渐形成的社会领域为出发点,思考劳工、乡民、政党、知识分子等社会主体的境况、价值和行动,孕育出与西方现代化高度类似的“发现社会本体—阐明社会弊病—规划社会发展”的社会建设基本思路。另一方面,社会建设的出场蕴含着突出的本土自觉。投身社会建设的实践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专制国家和宗法社会的上下紧张关系以及救亡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重大背景,为此,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跳出西方社会建设理论话语,尝试探索包括群众性政党建设、民生民权建设、城乡社会调查、乡村基层改造等方面的本土化内容,彰显出扎根社会、面向现实、自觉能动的方法论高度。这无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完善社会建设的成熟内涵质态

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10]159}。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弊病而带有系统集成的鲜明结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思维,从内外部元素要件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质态层面深入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成熟内涵,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建设“一体两翼”基本内容逐步明晰,以及社会

建设作为重要板块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结构性作用逐步凸显的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社会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以深刻的社会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事实上的社会建设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起航准备了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为准绳,准确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总体思路和依靠力量。针对前述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病症,恽代英提出:“许多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是产业落后的国民,当然的现象。这决不是中国民族性有什么弱点。要希望中国人能免于——一盘散沙之谓,不是用什么合群互助的空道理,去向他们强聒;是要靠政治的力量,发达产业,或用其他的方法,使人民相互间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革命党需要政权,用政权以组织人民,然后人民能有政治上的力量。”^{[11]282}这明确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所赋予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路的先进性,那就是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民作为出发点和主体,经由政党领导,通过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关系的彻底革命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以此为指引,中国共产党以各革命根据地为基础进行局部执政条件下的社会建设实践,发展农业生产,变革乡村社会关系,探索卫生、救济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教育来培育革命文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这有效完成了毛泽东提出的“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2]348}的目标,开辟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并为其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社会秩序巩固为内在指向的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赶超为核心目标,深化了社会建设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构筑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根基。一方面,党通过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治理城市失业和工资问题,解决匪患、烟毒、娼妓、封建婚姻等社会问题,从实际出发建立起以高积累、低消费、集中力量解

决教育卫生基本问题为特征的民生建设思路,回应人民的民生诉求。另一方面,党通过人民公社、单位制和城市基层街居制等组织化制度的创设,以及行政、宣教、群众运动等综合性治理手段,建立起一套有力有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活力。有学者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革命遗产和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需要催生一种革命教化政体,基于该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13]尽管存在曲折,这一社会建设的体制成果仍在总体上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开启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秩序保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为稳定板块的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工作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提出并逐步明确了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格局,框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维度的基本内涵。面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增大、民生需求和社会利益复杂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为基本思路,围绕社会体制改革展开持续探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社会建设命题,^{[14]287}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5]642},社会建设正式进入“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的民生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逐渐明确成为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两大核心内容板块,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之维民生与治理“两翼齐飞”的政策框架基本确定,关于社会建设在“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逐渐深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一体两翼”和“五位一体”的内外部结构为成熟质态的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两个大局”同步交织,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创新社会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之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

管理的提法,突出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分别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治理)两方面扩展阐述了社会建设内涵,形成了完善的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6]38}为目标,民生建设与社会治理为抓手的“一体两翼”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个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和战略部署,构造出以社会建设助推经济民生、基层民主、文化服务、绿色社会等重要工作,从而不断强化经济发展的共享属性、拓展人民民主的社会空间、夯实文化繁荣的群众基础、内化绿色环保的社会共识,实现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5个文明“五位一体”耦合发展的外在本结构。从这种内外部结构出发,新时代的中国走出了日渐成熟的、带有鲜明整体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书写提供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凝聚社会建设的创新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中华文明赓续创新的现代化范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7]5}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明思维,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自觉为基点,在连续和创新中体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以此为方法,有助于探究中华文明数千年积累的传统民生文化和治理文化何以在社会建设领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意义上、对应于社会建设“一体两翼”内涵结构的民生话语与治理话语。

(一)从民本厚生的传统民生文化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民生话语

民生文化是传统中华文明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宝库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一民生文化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民本”的理念认识和“厚生”的行动规定。民本,即是将民众作为国家的根本,也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8]369}一语所传达的核心意涵。在民本理

念的要求下,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来获取民心,由此有了利民、惠民的厚生实践。传统中国历代统治者形成了以“重农抑商、务本兴农;轻徭薄赋、体恤民力;减省刑罚、体恤民情;不违农时、使民以时;体恤百姓、救济贫民;约束官吏、勿使扰民”^{[19]382}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举措。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障民众基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中华文明爱民的鲜明特征之一。但不可否认,传统民生文化有其内在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将中国传统的民生文化重构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民生话语。一方面,社会建设高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承接传统中国以民为本的伦理诉求并将人民真正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加以彰显。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6]38}另一方面,社会建设牢牢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系统推进当代中国的厚生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20]19}。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21]150}。从“民生七有”到“民生七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实际出发对传统民生文化的价值继承和质量超越。

(二)从礼法合治、双轨并行的传统治理文化到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现代治理话语

中国传统治理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首先,传统中国将儒家礼治和法家法治杂糅并用,共同作为奠定社会秩序、调处社会矛盾的工具。儒家礼治通过尊尊、亲亲、贤贤来使社会和谐运行的王道思路,与法家尚力重刑,通过君定之法控制臣民、实现统治目标的霸道思路两者结合,产生了礼法合治的治理手段。其次,传统中国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基于疆域规模和行政能力约束,将一部分社会、文化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胥吏和宗族集团,从而形成了费孝通所言的“双轨政治”^{[22]336}。在

这种“双轨政治”下,皇权的统治并非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而是必须分配部分权力给基层官僚和社会力量,但由于儒家伦理教化和地方士绅群体桥梁作用的发挥,统治与自治又非截然分开和对立,而是共同构成顾炎武所称“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23][426]}的完整体系。上述传统治理文化,是推动传统中国保持稳定和弹性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为基本准绳,通过强调自身建设对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以及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全新阐述实现了传统治理文化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4][41]}。面对传统治理文化礼法合治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侧重通过道德评议、模范评选、家风涵养和移风易俗等手段强化治理的道德柔性;另一方面则顺应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强调“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25][1]},从而使专制政治框架下操于君主之手的礼乐刑罚转化为现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德治和法治手段。面对传统治理文化的“双轨并行”特征,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联系、服务群众过程中的优势,将党的基层组织打造为基层治理的坚强堡垒,以党组织建设为纽带将政府治理和基层自治衔接起来,破解“双轨政治”的断裂风险。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文明也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得以有序发展、传承创新,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参考文献:

- [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11-07.
- [3] 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J].历史研究,2023,(2).
- [4]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5]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6] 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7] 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8] 王先明.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0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J].史学月刊,2023,(5).
- [9] 孙本文文集(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1] 恽代英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3] 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开放时代,2011,(1).
- [1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15]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8] 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9] 夏春涛主编.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2] 费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23] 顾炎武撰.日知录集释(上)[M].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5]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顾良艳]